

朋黨與中國政治



徐洪興 ■ 著

朋黨與中國政治

百家文庫 · 史論集



徐洪興■著

中華書局出版

□ 責任編輯 安平

朋黨與中國政治

□

著者

徐洪興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

版次

1992年4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47 6

目錄

引論	一
----	---

上篇 沉重的歷史足跡	七
------------	---

一 處士橫議……東漢黨錮之禍	一二
----------------	----

二 朋比唱和……中唐牛李黨爭	二九
----------------	----

三 君子有黨……北宋新黨舊黨	四八
----------------	----

四 清流濁流……晚明黨社運動	七一
----------------	----

五 國家敗亡……歷代黨爭惡果	九八
----------------	----

下篇	多維的背景透視	·····	一一五
----	---------	-------	-----

六	社會制度的根源	·····	一一八
---	---------	-------	-----

七	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	·····	一四四
---	-----------	-------	-----

八	閹割了的政治怪胎	·····	一六六
---	----------	-------	-----

九	官僚羣體的分野	·····	一八四
---	---------	-------	-----

十	儒家理想的悲劇	·····	二〇二
---	---------	-------	-----

引 論

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之悠久是世所公認的，即使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起算，至少也經歷了二千餘年。在這漫長的年代裏，曾經出現過不少頗具特色的政治事象，如皇帝制度、外戚擅政、宦官專權、門閥政治、科舉取士、母后垂簾等等，朋黨以及由朋黨引出的黨爭，也屬於其中比較典型的一種。

「朋黨」這個概念，按照我國最古老的字典《說文解字》所講，是從「朋」這個字引申假借而來的。「朋」字的原始含義是鳳，鳳爲百鳥之王，鳳飛而成千上萬的鳥跟在後面，由此引申出「朋黨」這個詞^①。從這個解釋來看，「朋黨」一詞似無褒貶的含義。但在戰國以來的歷史文獻中，「朋黨」一般是一個專門的貶義詞，特別是秦漢以後，它

專指官僚士大夫中那些爲了自私的目的而相互勾結、樹立黨羽的小團體。至於「黨爭」的意思則不難理解，就是指朋黨之間的互相傾軋、明爭暗鬥。

過去有種說法，認爲中國歷史上的朋黨與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的性質差不多^②，這實際是一種錯誤的理解。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它們既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也缺乏既定的結黨宗旨，更不存在明確的政治綱領。大致而言，它們往往是由官僚階層中的某一羣人或某一類人，或由於政治利害的攸關、或因爲政治見解的一致、也有可能僅僅因爲志向趣味投合、出身籍貫相同這類緣故，在當時的政治鬥爭、權力分配、宮廷糾葛等事件中自然形成的鬆散的小集團。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朋黨不能與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相提並論，假如硬要用現代白話來對譯「朋黨」這個詞的話，我以爲「宗派」一詞似乎相對貼切一點。

我們說「朋黨」在古代中國是一個專門的貶義詞，這是因爲它既遭到中國古代統治理論的排斥，也使中國專制統治階級感到厭懼。

先從古代統治理論的觀點來看。大家知道，自從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就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官方正統思想，以後雖然歷經了朝代的更迭，佛、道學說的挑戰，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統地位卻沒有發生多大動搖，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依據儒家的觀點立場，朋黨和黨爭是應該受到排斥的。儒家學者把以仁義禮樂治理天下的「王道」作為最理想的政治形態；而「王道」政治是不允許也不會產生朋黨的，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書·洪範》）。此外，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的個人是有道德的「君子」（儒家認為最理想的個人應當是「聖人」和「賢人」，然而「聖賢」必竟只是鳳毛麟角、少而又少，所以對大多數人說來，能夠達到「君子」這個做人的標準就算很理想了），「君子」的立身處世有很多原則，其中之一便是不爭和無黨，所謂「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論語·衛靈公》）。

再從專制統治階級自身的立場上來看，「朋黨」歷來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字眼。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心底裏是非常痛恨朋黨的，正像唐朝李絳說過的那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全唐文》卷六四五）理由很簡單，如果臣僚們拉幫結派、

結黨營私，就會成爲中央集權中的一股異己力量，這將對專制皇權構成威脅。所以，歷代的皇帝大多以嚴厲的制裁手段來對付朋黨。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少權術高明的帝王，爲了更有效地控制爲數衆多的臣下，有時存心讓官僚之間互相攻訐、互相牽制，但前提必須是不損害他的統治地位。對大多數官僚士大夫而言，由於帝王痛恨朋黨，所以他們一般都懼怕涉嫌「朋黨」之名，哪怕實際上他們確實是在拉幫結派；同時，「朋黨」之名又是他們經常利用的一種重要政治鬥爭工具，把它加諸於自己對手的頭上。這理由也很簡單，就是爲了避免自己遭到制裁而使對手受到打擊。從歷史上看，大概只有宋代的一些官僚士大夫有點例外，他們不僅不怕涉嫌「朋黨」，而且還爲之正名，說什麼只有「君子」才能成爲朋黨。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這種爲「朋黨」正名的做法，恰好說明了他們對「朋黨」之名的畏懼，只是換了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既然「朋黨」爲中國古代統治學說所不容，又深爲歷代帝王所惡，爲衆多官僚士大夫所懼，照理說古代中國就不應該有朋黨的存在，更不應該有黨爭的出現。然而邏輯是一回事，事實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經常會發生矛盾。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事情往往就

是這麼奇怪，愈是受到推崇的東西愈是鮮爲人見；反之，愈是遭到排拒的東西愈是盛行不衰。朋黨和黨爭可說是這種矛盾現象的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社會裏，朋黨和黨爭非但屢屢出現而且形式多樣。它就像一種無法醫治的「歷史病」，緊緊地附着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這個機體上，每當出現政治昏暗、社會動蕩、外患內憂這些誘發因素時，它就會程度不同地發作起來，從而與當時的其他各種社會政治因素互爲因果，引出一系列政治變故，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正因爲中國歷史上有形形色色的朋黨和黨爭的存在，所以試圖論述或解釋這種事象的人歷代都有，僅以「朋黨」爲標題的專論文章而言就不在少數。自從范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序》中論述了東漢末年的「黨錮」事件後，唐朝有李絳的《對憲宗論朋黨》、李德裕的《朋黨論》……；宋朝的王禹偁、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均撰寫了《朋黨論》……；元朝有榮肇的《論朋黨》、許謙的《朋黨論》……；明朝有侯方域的《朋黨論》……；清朝的李固松、鄒永江、鄒代藩均著有《說黨》，連大名鼎鼎的雍正皇帝居然還有御制的《朋黨論》……。這裏所例舉出來的僅是信手翻檢文獻典籍時發現的一

部分文章，如果系統地查找肯定會找出更多，至於歷代其他有關朋黨和黨爭問題的論述就更多得無法枚舉。這個事實告訴我們，朋黨和黨爭已經成了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不能不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關注。

如上所述，朋黨和黨爭既然已經與中國古代的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那麼，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與政治狀況，顯然不能不對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有所了解。現在就讓我們循着歷史的足跡，先來瀏覽一下中國歷史上幾次規模最大、影響最巨，也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朋黨之爭。在了解了是什麼之後，我們進而可以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表象來了解爲什麼，即從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個不同層面中去探尋朋黨和黨爭在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根源所在。

上篇

沉重的歷史足跡

中國歷史上的朋黨究竟從何時開始出現的？這是一個很難說得清楚的問題。據北宋的一些官僚兼文人學者如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的意見，朋黨是古已有之的。名列「唐宋文學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其傳世名篇《朋黨論》中就這麼認為，早在唐堯、虞舜時代已經有「四凶」、「八元」、「八凱」這樣的朋黨了。這個說法在當時還頗為流行，但在我們看來卻似乎玄了點。因為堯、舜只是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的帝王，是否確有其人至少目前還難斷言。對這種無法說清的事情，最好的辦法是存而不論。

在公元前的四七五年到前二二一年的戰國時期，開始有了朋黨的說法。如《戰國策·趙策二》中，著名的縱橫游說之士蘇秦就曾勸說過趙王，「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蔡澤提到當時南方的楚國很強盛，而強盛的原因之一就是楚國能夠做到「禁朋黨以勵百姓」；此外，在《荀子》、《韓非子》這類戰國諸子書中，也都論及過「朋黨」。不過，戰國時代的中國，有系統的官僚政治體系尚未建立，因此儘管有一些關於朋黨的記載，恐怕也只能算是朋黨的萌芽吧。這種偶然的現象，對整個社會政治產生的作用即使有也不會太大，因而可略而不論。

中國的古代官僚政治體系，是隨着秦始皇一統天下，確立起專制獨裁的皇帝制度後應運而生的。秦朝立國時間很短，再加上始皇帝的絕對專制統治，所以朋黨現象還不明顯。從西漢開始，官僚政治的體系日趨完備，官僚羣體的構成日趨複雜，於是朋黨和黨爭也逐漸在史籍的記載中多了起來。《漢書·何武傳》記大司空何武，「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儒臣和文吏（習法律爲主的官僚）是當時朋黨分野的兩個主要面，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則是兩大朋黨間的一次重大的正面衝突。另外，宦官、佞幸（皇帝的寵臣）、外戚也有朋黨交結的現象。如西漢後期外戚王氏一門把持朝政，朝官和地方官多由黨附王氏之人出任，大臣劉向就曾上書漢成帝，抨擊王氏「朋黨比周」以營私利（見《漢書·劉向傳》）。到東漢中期以後，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各自結成幫派部黨，並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鬥，最終導致二次「黨錮之禍」的出現。

自此而下，幾乎每個朝代都或多或少、或緩或烈地有黨爭事件的爆發。史乘有明文記載的如：西晉的賈充、荀勗等爲一黨與庾純、張華等爲一黨的交爭。北魏有以崔浩爲

首的漢族官僚士大夫與鮮卑族勳貴國戚之間的殊死較量。唐朝中後期有張說與宇文融兩黨之爭，元載、楊炎與劉晏、盧杞兩黨之爭，最出名的則是「牛李黨爭」，還有朝官與宦官間的「南衙北司之爭」。五代十國時的南唐有宋齊丘爲首的一黨與孫晟爲首的一黨的爭鬥。北宋前有寇準、王旦與王欽若、丁謂的較量，中有范仲淹、歐陽修等與呂夷簡、夏竦等的「黨議」，以後又有「濮議之爭」，最激烈的是以王安石爲代表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爲代表的「舊黨」之間因「變法」而產生的黨爭。南宋時則有權臣韓侂胄一黨排斥趙汝愚、朱熹等人的「慶元黨禁」。元朝中後期的武帝至順帝間，蒙古貴族的派系紛爭常常導致刀兵相見和皇位易主，二十五年裏竟然換了八個皇帝。明朝剛立國就出現所謂的胡惟庸、藍玉「黨案」，內閣制取代宰相制後閣臣間爭權奪利的黨爭幾乎沒有停過，自萬曆朝開始直到南明小朝廷崩潰的八十餘年裏，朋黨之多、黨爭之慘烈更是超邁前代，一兩句話很難加以概括。清朝前期，有馮銓一黨與陳名夏一黨的爭鬥，有索額圖與明珠兩派間的植黨相傾，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後還有洋務派、守舊派、維新派、帝黨后黨、清流濁流之間的種種交鋒。如上所舉還都是比較明顯、比較激烈的黨爭。如果說不太明顯

的小打小鬧，那可真是無時不有，實在無法統計和臚列。我們可以這麼說，朋黨和黨爭幾乎是與中國君主專制社會共相始終。

在上面提到的這麼多朋黨之爭中，假如就其規模、影響等統起來而言，那麼無疑當推東漢、中唐、北宋、晚明四個時期的黨爭最爲突出，因而也更具有典型意義。以下我們就依次來看一看這四次最大的朋黨之爭。



- ① 《說文解字·鳥部》在「鳳」字下書鍾鼎文「朋」字，釋爲「故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清人段玉裁注：「此說假借也。朋本神鳥，以爲朋黨字。」
- ② 如胡余暄在《宋代的政黨政治》一文中就持這種觀點，詳見《政治評論》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七三號。

一 處士橫議：東漢黨錮之禍

繼秦朝、西漢、新朝之後，中國的歷史進入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時期。在東漢前期的六十幾年裏，由於開國君主光武帝劉秀的精明強幹、勵精圖治，嗣君明、章二帝的善於守成，所以國家的政治還算清明，國家機器運轉正常，整個統治秩序也比較穩定。但這樣的好景並沒有能夠長久維持下去，自漢章帝死後，東漢的政局便開始動蕩起來，出現了外戚、宦官交爭、輪流把持朝廷大權的黑暗統治。

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即太后和皇后的家族成員；宦官後世一般稱「太監」，也就是那些在皇宮裏專門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奴僕。由於外戚和宦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決定了他們成爲與最高權力化身的皇帝關係最密切、接觸最頻繁的兩類人，而這後一點